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

——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杨 俊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

——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杨 俊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 / 杨俊著.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54-0608-4

I. ①武… II. ①杨… III. ①文化—批判—政治运动—研究—中国—1951 IV. ①D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158 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任小平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创世禧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印张 2 插页 26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学术史回顾	1
第二节 主要研究方法和材料	7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上）：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11
第一节 理论渊源	12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18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31
第四节 “立而不确”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41
第二章 历史语境（下）：新中国成立初意识形态领域的 解构与建构	48
第一节 思想探源	49
第二节 新国家新政治新文化	56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队伍状况	60
第四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构”	68
第五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	74
第六节 特殊的意识形态部门——电影业	78
第三章 电影《武训传》诞生记	85
第一节 1949 年前的电影版本	85
第二节 重拍《武训传》	90
第三节 剧本修改和审查	100
第四节 编导的主观意图和实际效果	103
第四章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	109
第一节 “改良主义的影片”	110

第二节	“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117
第三节	组织讨论与批判	126
第四节	在《文艺报》展开批判	131
第五章	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发动	136
第一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136
第二节	批判运动的发动过程	140
第三节	“对事不对人”	144
第四节	批判运动的铺展	146
第六章	《武训传》批判的历史过程	149
第一节	批判文章分析	149
第二节	“疑惑重重”与“贯彻不力”	165
第三节	“动机与效果”之争	173
第四节	《武训历史调查记》	175
第七章	影响深远的批判事件	183
第一节	“电影就是政治”	183
第二节	“史学革命观”的萌发	186
第三节	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	188
第四节	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3
第五节	“小人物”和“大人物”	197
第六节	“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200
余 音		203
结束语		206
主要参考书目		214
后 记		226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学术史回顾

一、具有特别研究价值的重大事件

武训是清末山东东君府堂邑县（1956年堂邑县制撤销，其辖地分属今聊城市和冠县。）其特殊事迹是“行乞办学”。在他身后，人们对其人其事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义学正”，到“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从“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翻身的一面旗帜”，到“从皮肤到血管都充满了毒素”；从“封建社会的一具僵尸”，又到“千古义丐”……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武训这个文化符号所持的不同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及其变迁过程，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轨迹和逻辑。因为无论是讲述的武训故事，或是对武训故事的讲述，都是那个特定时代形象的铭记。当我们试图重新接近、理解、反省、告别、祭奠或者继承这些时代的精神的时候，我们都能从中获得对那个时代生动而丰厚的认识。

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1951年《武训传》批判事件。这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持续近半年之久的大规模文化批判运动，是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个重大批判运动。究其原因，并不十分复杂。如同每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需要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一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以前所有的新时代来临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新政权社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思想意识存在的长期性，旧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占主体地位的状况等，都决定了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新中国，在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开创性、革命性和艰巨性。因此，新中国成立时，中共中央在竭力抓“政权机构等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的确立和巩固

的同时，也密切关注“上层建筑里面虚的部分”的“破旧立新”。^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毛泽东针对当时电影《武训传》播放后，社会上“好评如潮”中所表现的“思想混乱达到何等程度”，即在关涉“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严重影响，为配合当时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发动的一场借讨论和批判《武训传》，旨在宣传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武训传》事件，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段历史的本原和历史的所以然，不仅仅是“正本清源”，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的问题，也是一项“充分批判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的政治任务。

当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个事件时，就会发现这个从表面上看似简单的事件，其实极具“复杂性”和“神秘性”，至今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具体地说：其一，这部影片是经党的文艺界领导提议和支持，由“民主进步人士”编导，并且“自觉按新民主主义要求进行修改”，最后经过党的相关部门审查通过的。影片公映后，几乎所有看过该片的重要政治人物^②、文教界知名人士，以及普通观众都对该片持肯定态度，但就在“好评如潮”不到两个月后，该片却被中央要求进行批判。其二，从看这部影片时，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思想，不满意该影片对一些事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艺术诠释，但并不同意发动对该片的大规模批判。当看到社会上“好评如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混乱”状况后，毛泽东也只是决定在一定范围、以党内指示的方式进行批判。直到5月初才决定进行大规模批判。在整个批判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对批判的方式、对武训本人的评价也是有所变化的。在从政治原则的高度要求严肃对待《武训传》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再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其三，在改革开放后，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批判运动事件，中共中央都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过历史判断，大多数进行了彻底的平反，但对于批判《武训传》这个重大事件，并没有采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做出历史决议，也没有彻底否

①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对周扬等人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政权机构——政党。这是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虚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见《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页。

② 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周扬、陆定一、郭沫若、茅盾、袁牧之等中央领导和部门主管领导。

定最初的定性。这一复杂现象本身就说明,批判《武训传》运动,并非简单的“冤假错案”,而具有非同寻常的原因与背景。^①上述这些“奇特”现象,都说明该事件在共和国史上独特的研究价值,因为任何历史“奇特”现象,都隐藏着特殊的原因和背景,一旦我们“破译”出它的“潜在的密码规则”,找出其“奇特表象”下完整的逻辑程序,我们就可以得到极为生动、丰厚的历史启发和教益。

这个批判事件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层面的巨大建构意义极为重大。通过此次大规模的批判,以及由此导入的1951年底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和“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其基本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普及。不仅如此,发端于该批判事件的思想批判运动的模式、方法和经验,诸如把文艺作品的批判作为思想文化改造的重要内容的思想认识,以文艺批判为政治运动突破口的运作方式等,都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②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标志,拉开了“现代的时间”的序幕,在这张大幕后面,一个全新的历史英雄正在向我们走来,一个伟大的历史代言人主体正在诞生。《武训传》批判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段”,正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时代,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基和开创的。通过剖析批判《武训传》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语境,也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提供前提条件。在这个事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的政治精英、文化名流都

① 对这次批判运动是1985年9月5日用发布胡乔木关于该运动讲话的简短新闻的办法作的结论。当时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指出,批判《武训传》运动“是非常片面的、极端的、粗暴的,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也不该批判倾向是进步的、没有责任的编导和演员,以及株连到陶行知思想及其活动。胡乔木同时说:“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对此问题,本书有详细的阐述。参见《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第1版。

② 从如下政治人物和学者表述该批判事件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该事件的重要意义:当时文艺界主要领导周扬在1951年10月总结该事件时说:“全国文代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艺界是‘平静’的,没有思想斗争、思想批判。直到《武训传》的讨论,这才打开了文化界、艺术界思想斗争的风气。”(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7日,第3版)改革开放后,李泽厚说:“‘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从文化批判开始的,这‘文化批判’又是继承着自批《武训传》开头的建国17年来一系列名为‘文化批判’实际是政治批判而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直到最近,有的学者仍然慨言:“这场运动在新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王洁:《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见《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涉及了。除了在这个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毛泽东之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政治领导人，思想文艺界的主管领导如胡乔木、周扬、陆定一、夏衍、钱俊瑞、柳湜等，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冯友兰等，“体制内文化人”袁水拍、杨耳（许立群）、胡绳、邓友梅、何其芳、范文澜、翦伯赞、华君武等，身份特殊的江青，甚至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物，都在此批判运动中有极具象征意义的角色体现。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用倒放电影的办法”，发挥所谓的“当代史式的后见之明”^①，即我们可以通过被随后历史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的方面，去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的思想、态度，以及他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认识和反应，从而获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政治的深层体悟和启发。

二、当前研究状况

长期以来，人们对电影《武训传》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政治批判，对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也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为这个“文坛第一案”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1980年张经济首先在《齐鲁学刊》发表《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来信呼吁“在重新评价武训的问题上带个好头”。该文被许多报刊转载，从而引发了对武训事件的关注热潮。此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1951年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就人物评价问题做了一些理论探讨。这里面，大多数文章都是为武训、为电影《武训传》鸣不平的。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与此观点相对立的文章见诸报刊。

1985年9月5日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做出对《武训传》批判事件的政治评价后，研究武训和批判《武训传》运动掀起了高潮。此时国内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武训家乡山东省成为研究武训的重要基地，他们主要以研究武训的生平、事迹和“武训精神”为研究重点，对武训和《武训传》做出了新的评价。1987年以山东为主的院校组织了武训研究课题组，1991年和1995年以这个研究课题组为发起人在武训的故乡山东冠县主办了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并于1996年主办了纪念武训100周年诞辰暨研讨大会。这个研究课题组和这三次研讨会先后出了一些论文和专著，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张明主编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该书把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有影响的关于武训的材料收集成册，成为研究武训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二，研究的思维、角度、方法日益活跃。这些

^① 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研究对批判《武训传》发动的原因、经过、影响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李希凡、林默涵、夏衍、孙瑜、于光远、张劲夫、陈晋、王蒙、王若水、姜义华、杨奎松、李泽厚、李庄、李辉、王宝民、冯锡刚、袁鹰、陈世英、陈世娟、王善中、戴鹿鸣、笑蜀等都发表过与该事件相关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事件做出了极为有价值的探讨。^① 在研究专著方面，对武训和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做出了专门研究或论述，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袁晞的《〈武训传〉批判纪事》、黎之的《文坛风云录》、孟犁野的《新中国十年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等。《文坛三公案》成书于改革开放之初，其基本内容和观点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尽管已经不再新颖，但其“拓荒之作”的地位不容忽视。而后三本专著，由于作者特殊的便利条件，得以掌握到许多第一手材料，使其著作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②

在港台和海外也有许多对该运动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成果：何平华所著的《中共开国后第一文化罪案考》、黄平的《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等论文，[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美]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美]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美]詹姆斯·R. 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著的《中国政治》、[英]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英]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美]罗斯·特里尔的《江青正传》、[日]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100年》等专著，都从自己的立场、方法和角度对该批判运动进行了有意义的、多角度的分析或陈述；余英时、邹谠、林毓生等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文章或论著，也都对我们认识该事件的起因和背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以上的研究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意见：（1）认为《武训传》作者本意也许是好的，但影片的主题是有问题的，影片艺术手法、情节上也都有失当之处，所以，批判《武训传》是有客观原因的，批判也是有积极作用的；问题在于批判的方式、方法是错误的，失之于“政治运动代替学术批判”和“片面、粗暴”。这是当前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和大多数论者的观点，胡乔木、林默涵、胡绳、戴知贤、王善一、黄清源等人都持这种观点，由权威部门修

① 这些涉及批判《武训传》运动人和事的文章，在《炎黄春秋》《百年潮》《党的文献》《齐鲁学刊》《聊城师范学院学报》《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刊登居多。

② 袁晞系1951年《解放日报》编辑袁鹰先生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在《人民日报》报社工作；黎之“文革”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孟犁野1951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他们都接触过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

撰的史书也都是坚持这种认识的。^① (2) 一些研究认为武训继承发扬了“仁者爱人”的思想,秉持着淑世济人的宏愿,走的是教育救国的路,故当时“毛泽东错误地理解了武训”,“错误地发动了批判运动”。这些研究带有“辩诬翻案”的意味。这些研究对该运动的“简单粗暴”“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还进行了特别的批评。(3) 海外、港台等许多研究者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或西方研究中国的范式去考察该运动,^② 认为该运动是毛泽东有目的地“把革命的学说与政党的意识当作一种真理传播开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向知识分子灌输马列主义。”^③ (4) 有些文章坚持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和对它的批判,都不是偶然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中新旧矛盾斗争的反映,“究其实质,也可以说这是建国初期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第一次的激烈较量”^④,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讨论白皮书以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继续,所以,批判完全是正当的、正确的。

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运动的“性质”和“影响”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但在下列方面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1) 对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仍然不够详尽,并没有完全说明当时中共领导人发动批判运动的历史语境,也就不能比较完整地说明在此历史语境制约下发动的批判运动的原因及其发展逻辑。^⑤ (2) 对运动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动因、模式、规律和发展逻辑,也还缺乏较为系统的政治学把握;对这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运动艰难、变动着的决策过程,还没有详尽的过程描述和历史考察。(3) 有些研究只侧重于“辩诬翻案”,对运动的评价简单化和情绪化,这特别表现在对运动中重要人物的研究方面。譬如对毛泽东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用意及其原因缺乏全面的、有深度的分析;对周恩来也只是赞扬他的温和,似乎因为他的努力,批判《武训传》运动才没有出现过于严重的后果的,而

① 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籍都持此说。

② 主要是指所谓的集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中国政治》就是持此看法。[美]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③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费正清编,王建朗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④ 李希凡:《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

⑤ 许多论文也罗列了当时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但基本上还是认为:“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社会上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反革命分子还在继续捣乱、破坏,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必须开展。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战线则更是而对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李希凡:《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这种分析,其实并没有完全说明当时中共领导人发动批判运动的历史语境。

忽略了电影《武训传》的修改以及通过拍摄,与周恩来的修改意见和支持态度有很大关系;许多文章要么忽视或回避江青的作用,要么把批判《武训传》的缺点或错误完全归罪于“江青所起的坏作用”,并且简单地认为江青只是出于“忌恨熟悉她的电影明星史的人”,或是忌恨陶行知把她比喻为“夜莺”的诗句而要求批判此片。同样,许多文章一味地突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受难史”,而忽略了在当时环境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也是虔诚的、自觉的。^① (4) 大多数文章都承认事件本身的意义巨大,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文革”准备的第一块基石,但对这块所谓的“基石”的制作和构成的问题并没有详细的论述。仅仅承认批判《武训传》在新中国的批判运动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在哪些方面具有“承前”,哪些地方又有“启后”的意义。这就需要对运动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动因、模式、规律和发展逻辑,批判运动的实际效果及其所必然带来的弊端进行深入研究。(5) 许多研究提出,这场批判运动是“粗暴的”和“片面的”,关键在于“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②。许多学者们至今还在感慨:“假若毛泽东不是以领袖的身份出面,不带那么大的情绪化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指责,那种讨论就应当是有意义的”^③。这里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区别学术、艺术与政治,而在于当时毛泽东对《武训传》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所以在新中国政权仍然没有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下那么大的决心去大规模地批判“区区一部电影”,就是因为他认为《武训传》以及当时对《武训传》的歌颂,不是“一个具体的文艺问题”,而恰恰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

第二节 主要研究方法和材料

一、研究角度与方法

正如前面所说明的,对批判运动的性质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历史

① 比如,苏里导演曾说,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士真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参见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② 忠民:《〈武训传〉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文汇报》1993年12月4日,第7版。

③ 晓峰:《毛泽东之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

研究不仅仅是讨论事件的结局和定性（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也要探索事件产生的过程。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话来说：“在目前这个语境里，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谴责中心主体及其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它的历史形成、它的确立或作为幻景的实际构成，而这种幻景显然也是某种方式的客观现实。”^①由此，本书重点关注的是把批判《武训传》运动放在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加以考察，着眼于对“事件”作探源式的辨析，在充分利用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该事件发生的诸多复杂因素，清理出对象的机理及内在逻辑，揭示出这一重要事件发生、演化的脉络的历史根据，从而使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并转化为可供后人利用的精神文化资源。在研究过程中，本书注意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重建”历史具体情景（历史语境）

历史语境是指历史事件的当事者们所处的具体背景。任何历史事件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发出的，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有着特定的情境，超出这个情境去认识就只能是幼稚的。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只能以“彼时彼地”的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决策者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去“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用柯文的话就是“移情”（empathy）——“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历史研究者自身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里。^②本书的研究是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来考察这个事件的，力图设身处地（empathetically）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体察当事人的动机意向，分析这些动机意向背后深刻的历史根据，从而使历史的叙述显示出“合情合理”的一面。当然这里所谓的“合情合理”，并不意味着就赞同对方的思想感情，“同情于一种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件事。”^③

（二）“实事求是弄清楚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

历史研究需要我们努力把历史事件的过程理解为生成中的历史，尽可能不带感情和偏好，从客体的意义上去把握它。人们在接触该事件时，很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批判是粗暴的”价值预设，从而把整个文章都围绕在说明“何以是粗暴的”模式上，很难再进一步弄清楚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这使得新的、有跨越和突破的研究成果难以出现。对于已然逝去的批判《武训传》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② [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③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全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附录。

一段历史，我们现在公认批判的确是存在有粗暴的现象。然而，把历史理解成一连串“荒谬”的故事组合，是片面和肤浅的，也无法转化成可供后人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为此，本书通过实事求是考察这段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就基本观点来说，所做的创新尝试如下：其一，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背景，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出现的“思想混乱”体现出的问题实质，决定发动批判《武训传》运动的严肃和审慎的政治思考等方面，论述了作为思想导师和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可谓是“理固如此，不由不发”。其二，批判《武训传》，并不是一个“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问题，就毛泽东的思想认识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原则性质”的政治问题。其三，这场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发动后，的确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简单”“粗暴”现象，但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从政治原则的高度要求严肃对待《武训传》讨论的同时，一再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

（三）避免使用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

无论是理解还是阐释，都必然需要适当的理论工具。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来对该事件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可以说是本书一个自觉的追求。本书对事件的探讨借鉴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毛泽东学”、历史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面的一些成果。葛兰西、阿尔都塞、费正清、柯文、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孔飞力等人的论述在本著中多有提及。然而，西方的理论都是从西方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以西方为理论背景的，由于东西方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差异，这些理论显然不能照搬照抄来削足适履地分析中国问题，如果不能批判地吸收，其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流于表面。本书努力坚持一方面大胆吸收西方理论、方法，又坚持以活生生的研究对象为本位，避免使用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去切割史料，印证某些西方理论。论者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他山之石。

二、研究的条件和资料

学科研究的进展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对新材料的发现，一是对已有材料做出新的理解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新材料的发现导致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理论模式的出现，而新的研究视角、思路与理论模式也常常导致对以往视而不见的材料暗角的再发现。

不少人认为批判《武训传》运动的研究，存在着资料来源方面的限制，即便有一些资料，内容也往往未必可信，加上这个当代史的事件，距离我们“太近”，研究者本人容易情绪化，因此难登大雅之堂。但本人认为资料不足、

易于情绪化是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克服的困难，并非研究当代中国史所独有。当代史研究的确存在着史料上开放性不足的问题，但研究批判《武训传》运动这种接近于思想史的问题，对档案开放的需要不是特别大，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允许重新解释的环境。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批判《武训传》运动的政治敏感性已经越来越小，限制也越来越少，使得这方面研究能够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在思想解放大步前进的同时，史料也不断丰富，一大批文献、档案、内部刊物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等史料得以问世或披露，^①一些海外资料也得以传到大陆来，这些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包含了不少实质性的新材料，使我们可以对这一段历史予以新的、比较完整的阐述，把研究引向深入。

笔者到上海档案馆、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处资料室、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电影局、人民日报社、文汇报社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内部出版的材料，以及1951年批判《武训传》时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内部或公开出版的小册子、文献材料和报刊资料。

本书采用了许多官方报刊的资料，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这些官方的报刊在报道各地各方面各种人物在贯彻中央开展运动的指示方面，应该是真实的。尽管这些报道不能完全反映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实际效果，但贯彻指示而开展批判，已经实实在在发挥“政治作用”了。其次，报刊上发表的形形色色的批评文章和知识分子写的自我检讨，本身就是这个运动的构成要件，不论这些文字是否在违心或被迫条件下写成，作为署有作者名字的作品，已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符号存在，已经在作者和公众心目中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以后的批评运动。本书也对“文革”时一些涉及该运动的讲话、文章进行了分析，这些材料尽管由于带有过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和感情色彩，而对历史的真实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和歪曲，但如果用“批判地研究的方法”，并与“文革”后正式发表、出版的相关文章和书籍进行相互的考证与勘误，是可以从这些当事人对事件本身的表述中找到一些有用线索的。

① 如夏衍、孙瑜、赵丹、黄宗英、钟惦棐等当事人的回忆和访谈录，山东堂邑县领导与群众对调查武训历史的回忆文章，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李庄的回忆文章，《人民日报》编委会政治秘书燕凌的回忆文章，中宣部的黎之的回忆文章，等等。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上）：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①

——毛泽东：《关于税收和失业问题给陈毅的电报》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特别是列宁、斯大林的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理论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在中国这个生产力仍然不够发达，但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在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因素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要把广大的“资产阶级”视为“团结的对象”，允许“资本主义必要的发展”，以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为采取“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步骤”奠定基础。这个理论决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忘记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新民主主义所强调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允许资本主义必要的发展”，都不是为了实行资本主义，恰恰是为消灭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的“迂回”——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基本的物质基础、政治力量和阶级条件。新民主主义历史实践揭示出新民主主义的核心与灵魂在于它规定了社会主义因素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因素不断生成与壮大、非社会主义因素不断被限制与消灭的动态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时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是中共领导人严格遵循了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并且是中共领导人对当时国内外严峻形势的严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2 页。

估计^①，对自身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方面的经验与意见等因素所致。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敌对的阶级，把资本主义作为取代的对象。由此，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立”而不“确”的，^② 具有很大的策略性、变动性和过渡性，实质是以“我们的力量”和“非我的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制定和决定政策的。在此历史语境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强调要允许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强调“要团结和利用资产阶级”，“不要四面出击”。另一方面，“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没有偏废，而扫除那些可能会起“颠覆作用”的“旧的社会势力与旧思想”的斗争，更是坚决而小心翼翼地进行的。

这就是1951年《武训传》批判事件这场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政治运动发生的历史语境，它内在决定了这场批判运动的发生原因、发展逻辑和历史特点。

第一节 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的政党，其思想、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都可以在马列主义那里找到理论渊源。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领导人对新国家建国纲领的思考和实践、确立和更替，必须首先追本溯源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论断，才能抓住理解这些问题的根本。当然，马列主义千条万绪，其经典作家的著作更是多得可谓汗牛充栋，我们的考察范围只能是经典作家的理论论断中对中共领导人当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产生巨大、直接影响的内容，这就主要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编年史的观点，列宁、斯大林的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的论断和指示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编年史的观点

除原始社会外，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阶级结构决定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人类社会

①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时面临极为严峻、复杂的形势，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则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的谨慎态度认识形势的。具体论证见后文。

② 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列为三种错误观点之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